

第三十六章

走向光明

我和助手小田处得十分融洽，由他口里了解到许多市警察局的内幕和奇闻。据他的介绍，木村老头对我的酬谢与其被没收的财产相比，是牛早被牵走了，只拔下一撮毛给了我而已。抓捕木村时，外事处曾从洋行的仓库里运出了大批的西服、呢料，成包的白糖和成箱的化妆品。这些东西全按敌产没收转卖给了商人，然后从局长往下层层分红。各警处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人生财有道。特别是对俄工作组的几个白俄侦察员，他们竟做起了倒卖枪支弹药的军火买卖来。那个混血的于警官就是他们这种买卖的主持人。此人精通中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周旋在白俄流氓、犹太商人和苏军军官中间，卖枪支、倒弹药不动声色，如鱼得水，胆大包天，肥得流油。我和小田得的这点小钱，人家根本不屑一顾。

不久，发生了一起朝鲜人对朝鲜人的人命案。由于我的参与不但“圆满”解决，而且大家全得了实惠，使我在外事

处一下子红了起来。

这个案子说起来并不复杂，但因牵涉到了苏联、中国、日本、朝鲜四国人，倒弄得有些棘手了。这案子的主角是个朝鲜人，姓朴，由于当二鬼子时间太久，忘了祖宗，久而久之连本国话也不会说了，只会日语，自诩为半个日本人。这老朴在“八·一五”之前，和日本人合资办了一个建筑公司，雇用了大批中国、朝鲜工人。日本投降后，日本人一跑，这家公司的一切财物自然全被老朴据为己有，成了百万富翁。但是由于公司拖欠了下面工人许多工资，韩国的工头们领着大批工人来向他讨要工资。这家伙竟然一毛不拔，连工头们的工资都不发，更何况下边的苦力了。于是，被激怒了的朝鲜人人人手拿大棒、铁棍子，堵在了老朴的家门口，扬言非活劈了他不可。

这个老朴见事不妙，从后窗户跳出来，跑到外事处来求援。他通过一个白俄找来了几个苏联大兵去现场鸣枪镇压闹事的工人。事有凑巧，在建筑工地上，士兵冲天开枪，枪口稍低，竟然将楼顶上的一个工人打伤，掉下来当场摔死。事情闹得更大了，无法收拾。大鼻子兵揣上钱耸耸肩膀走了，老朴却背上了人命官司。那些如狼似虎的韩国工头更是火上浇油，逼得老朴一头钻进了警察局外事处来避难，要求保护。余局长知道后，觉得这是一块肥肉，不叼住纯属犯傻，立刻指示外事处讨价十五万红军票包揽此案。

在新华楼大饭店我们开了一桌酒席，以鄂胖子为首召集了十来个有关人员，边吃边喝边研究，讨论如何落实余局长指示，将这十五万红军票弄到手。那两个白俄酒鬼出主意说干脆找几个苏联大兵杀了那几个领头闹事的了事。我却劝阻，为这点钱杀人不值得，反而容易将事态弄大，将来不好

收场。并当场提出了一套软硬兼施，既弄到钱又两头买好的方案。大伙一听，认为可行。接着进行了细节分工。最后决定由我与老朴交谈（这家伙只会日语，别的话全不会说，只好由我出马），想办法逼他拿出十五万来，少一分钱也不行。否则政府不再管了。当然对他的人身安全也再不负责。鄂胖子则负责对那几个韩国工头进行劝阻，提出以八万元的代价解决问题。其中包括死者的丧葬费、抚恤金及众人的工资。于二毛子负责指挥中、俄“警员”携带武器、手铐恐吓助威于周围，对当事人双方施加压力，使其就范。周督察长代表警察最高长官坐镇监督事态发展。时间定在明天下午一点钟，在局二楼会议室一审定案。几个“警员”散下去通知双方，先将这个条件分别通知他们，使其有个思想准备。然后，开始唱戏。

第二天，老朴拎着个提包先来到了外事处与我见面。一点刚过，原告方来了两个工头代表，一个姓崔，一个姓金，被带到了二楼的会议室。鄂胖子、周督察正襟危坐，连喝叱带官腔，一通威胁利诱。周围四五个警察挎着枪虎视眈眈。那架势哪像审判，纯属绑票。两个工头万般无奈只好同意收下八万元结案，并在文件上签字画了押。小田立刻下楼俯耳告诉了我。楼下的外事处里，我正以日语和老朴对阵。这家伙其实已将钱如数带来，只是实在不甘心。拿出这笔钱有如剜肉抽筋，恨得咬牙切齿。对这家伙我用的台词和楼上一样，连逼带吓，声色俱厉。身后两个彪形大汉一边对他侧目而视，一边咋咋地摆弄着手枪，制造恐怖气氛。似乎是如果不答应，就得小心挨黑枪。但老朴坚持只付给对方十万，余下的五万情愿酬劳给咱们外事处。我正言厉色告诉他，这十五万必须如数付给原告，警察局是出于保护他的人身安全着

想，平息事态，维护治安，钱是一分也不要的！只要按我们的话做，警察局保证他今后平安无事。这时，老朴才拉开手提包，把十五万元红军票给我过目。小田立刻上楼通知了鄂胖子，拿着那两个工头画了押的文件下来，交给了他。老朴接过看也不看，忿忿地塞进兜里：“混蛋，畜生！”骂不绝口。临走，连连向我和鄂胖子鞠躬道谢：“今后一切拜托了！”然后悻悻而去。

鄂胖子从提兜里点出八万元来，上楼去打发两个工头滚蛋，剩下的七万元便成了警察局的赚头。其中拿出五万元来由周督察长去送给余局长，剩下的两万元归外事处分成。轮到我名下是两千元，自己挺满意。当晚，庆功宴又在新华楼举行，全体办案人员弄了个一醉方休。

灯红酒绿的哈尔滨，表面上仍是一派繁华景象。“劫收”大员们一边疯狂地搜刮、敲诈，一边挥金如土。然而，这种局面岂能长久。

随着四平战役的胜利结束，北满的大多数城镇和广大农村已经成为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反霸斗争如火如荼。伍修权将军正在和苏联当局谈判苏军撤离问题，哈尔滨的解放已指日可待了。

在这期间，1946年3月9日发生了暗杀李兆麟将军的事件。令人吃惊的是，凶手中竟然有原江上军作业队的上尉连长阎钟章和少尉孙海镜。那个诱骗李兆麟将军的女特务我也认识，她叫孙丽娜，是个混血儿，她弟弟是我高小三年级时的同学。这个孙丽娜长得并不漂亮，只是皮肤白皙，身材健美而已，小时候我常在太阳岛的浴场上看见她，不知何时她已成为了军统特务。

1947年春，公审大会在李兆麟将军的墓前召开（即现在的兆麟公园），参加大会的各界群众成千上万。站在人群中，我亲眼目睹了阎、孙等人被当场枪决。而那个孙丽娜却逃之夭夭，后来传说她跑到了台湾。

当时，李兆麟的公开身份是“中苏友协”会长（化名为张寿钱）。暗杀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哈尔滨市警察局（“蓝色”）曾假惺惺地派人到现场视察过。其后我也曾随他们一同走访了中苏友协院内的苏联驻军宿舍。一个苏联军官光着膀子，浑身是毛，晃悠悠地走出来，身后床上有两个半裸体的日本女人还在睡眼惺忪地躺着。于二毛子冲他哇啦半天，这家伙双手一摊，只说了句“我不知道……”就进厕所去了，意思是这事和他毫无关系。

1946年4月28日，解放军大踏步地开进了哈尔滨市。老百姓并没有听到枪声，一觉醒来，已经改天换地了。

其实，哈尔滨的解放正如瓜熟蒂落，是自然而然的事。几天前，人们已经对时局有所觉察，那一百多个驻扎在市第一中学的“国军”一夜之间突然“七遁”，踪影皆无。学校里满院子扔的全是军服、杂物和啃光的骨头，只是没有枪支。

警察局长余秀豪已经两天没露面了。周督察长拿来成叠的红军票分给大家，说是慰劳金。不过大家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遣散费”，分了钱，赶快走人吧！

到下午，人们已经悄悄离去了大半。我把“张口等”拉到前腰，跑到楼上去了解情况，正与下楼的老田撞个满怀。他挺镇静，告诉我：“老弟，走为上策，咱们后会有期。”挥挥手下楼去了。

周督察长已换上了一身便衣，看见我不禁尴尬万分。他一直怀疑我是“八路”，冲我连连点头哈腰，侧身退走，生怕我在背后给他个黑枣吃，弄得我哭笑不得。大楼里已经空无一人。我捡起个篮球拍了两下，打算回家和孩子们去玩。一出楼门，隐约听见后院里有哭泣声，原来牢房里还关着不少犯人呢。

我忙回到办公室从鄂胖子的抽屉里找出钥匙跑到后院。往牢房里一看，十几个犯人不知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一连两天没人给送囚饭了，正饿得发昏。其中俄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大概都有，一个个眼含泪水跪卧在泥地上，哀声不绝。我把钥匙塞进锁孔，一脚把门踢开，以袖掩面挡住牢房冲出的臭气，转身疾步走出大门。

从此，我又成了一个无业游民。

自从哥嫂从北安回来后，家里居住不便，而我又添了个男孩，更显得拥挤不堪。于是我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搬到了道里区的二道街去住。虽然暂时还不至于挨饿，但前途渺茫，心里空荡荡的，每天出来进去地闲逛，情绪十分消沉。

走在街上，我曾发现原江上军司令部的两个日本姑娘打字员佐田和幸岛正跪在地上给行人擦皮鞋，还有一些江上军的校、尉级军官变成了卖香烟的小贩和小吃摊的老板。还有的在火车站扛货包、当苦力……这些过去肩头挂着三两个星花的老爷，如今为了衣食也变成贩夫走卒了。

在熙熙攘攘的中央大街，又碰上了我的好朋友王升利小两口儿，他们喜气洋洋地告诉我，刚刚在双城堡乡下廉价地购买了大片的土地，如今已是土财主了！另一件事是他终于找到了咱们大学里的那个幸存的日本教授江口，把毕业文凭

弄到手了，其中竟然还有我的一份，让我抽空上他家去取。我心里明白，那早已是废纸一张了，但仍然向他道谢，答应去取。临分手，他又告诉我，听江口教授讲，校长涩谷三郎全家都自杀了。那是个留学德国的少将级在乡军人，我曾听过他几次讲演，狂妄、好战，是典型的法西斯分子，凭他的身份、官衔，不自杀也得被送上军事法庭按战犯处理。

哈尔滨的局势逐渐安定下来。“劫收”大员们带着搜刮来的金条、元宝跑得一干二净，日本人正在被陆续遣返回乡。苏联红军正在按计划分批地撤离。共产党政府很负责任，在苏军撤走的同时，发行了货币“东北流通券”。老百姓可以拿手中的红军票兑换，比值虽然稍差，但老百姓并没觉得吃亏，因为跟大鼻子发行红军票时的土匪行径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我把自己积蓄的红军票全都换成了“东北流通券”。算计一下，全家四口人一年的生活还不会有问题，心里才多少踏实一些。

1947年冬天，我渐渐感到身体不适，胃逆，心堵，胸腔憋闷异常；眼睛和皮肤渐渐发黄。医生诊断为黄胆病（肝炎）。看了多家医院，吃了不少付苦汤药终不见效。身体渐渐垮了下来，连走路都直不起腰来。

有一天，我从药铺就医抓药回来，在新城大街上迎面驶来一辆华丽的客座马车，车两旁是挎着盒子枪的警卫员，中间坐着一位解放军军官，还带着一个穿戴时髦的妖艳女人。人车交错而过时，我才发现这人竟是在江上军时常给我开摩托车的上士佟玉，这个流氓、兵油子。记得光复前他曾因抢一个老妇人的烟摊，打瞎了老太太的一只眼睛，被军法处判了一年徒刑。如果不是我从中斡旋，他至少要判二年以上，

还得挨顿胖揍。从前，他到处惹是生非，多半由我出头替他开脱，然后申斥一顿了事。

最后一次，因为造成了重伤害才真的把他关了起来，监押在齐齐哈尔的军队监狱中。日本投降后，他大概与何正卓等政治犯被一同放了出来。不知怎么弄的倒变成共产党的高官了，真叫人莫名其妙。

我正心中纳闷，一回头看见那辆马车已在几十米外停了下来，车上的两个警卫员正跳下来推开人群向我走来。我摸腰间的“张口等”，心说不好，这下要大祸临头了！

“左爷，上车吧。我送你回家。”身边有人说话。我一看，正是我那拉洋车的邻居严老四，不知啥时候来到了我身边。我忙一步跨上洋车，顺手将腰里的枪塞进了屁股底下的棉垫里。严老四还没走出两步，已被赶上来的两个士兵拿枪拦住，我只好下了车。

两个当兵的让我举起双手，对我上下搜身，这时，严老四拉着洋车已经走远了。我整整衣襟，问两个当兵的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你心里清楚。”他们啥也没搜着，有点泄气，把盒子枪掖好，头一甩：“咱们首长让你不许乱说乱动，明白没？”转身跑回去了。

我吐了口唾沫，心说：“我当然明白，你这个忘恩负义的鳖犊子！”

晚上，严老四给我送来一大卷煎饼，笑一笑放下，走了。我一拿，沉甸甸的，里面一张油纸包着我的“张口等”。

提起白天的遭遇心有余悸。老婆劝我把枪交出去算了，留在身边早晚是个祸害。社会治安虽仍然很不好，但我们心自问自己绝无一个仇人，留枪防身似乎也没太大的必要，只

是心中有些割舍不得。

哈尔滨市公安局如今已有解放军代表。那个混进来的局长周维斌和他的虾兵蟹将不知又投靠哪里去了。我打算先探探风头，然后再决定交不交枪。

这天，我又在十一道街的药房“世一堂”抓来一大包药拎在手里往家走，忽然听到街上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抬头一看，面前站着的一男一女正是原江上军司令部的上尉吴军医和他的太太。吴军医看到我的病容大吃一惊，没等我开口，早已断定了我的病情。他一把抢过我手里的药包就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箱，吼道：“你个傻小子！昏得发疯啦？再吃这种药，一个月后你准死无疑……怎么才碰到你呀！”说着掏出一个本子，匆匆写上一串拉丁文药名，并用日文字母标示清楚，叫我立刻到市场上去找这种针剂，只买三支，多一支也不要。每隔一天打一针，一周后如果不见效让我再去找他。并热情地告诉了我，他和夫人在森林街开设的诊所的地址。告别时还叮嘱再三。

望着他们夫妇离去的背影，一股暖流涌入心间，重病在身的我不知不觉已是热泪盈眶了。这个吴军医与我并无过厚的交往，在江上军时我只请他给我看过一次牙。平时头疼脑热找他要点药，他也从未拒绝过。他是留学日本念的医科大学，回国后想开个私人诊所，但受不了社会上地痞、流氓的欺凌、骚扰，只好当了军医，靠一身军服保护自己。他从不欺下媚上，谁来看病都一视同仁。不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不论司令还是勤务兵，对他都很尊重。也从没听说他冲谁发过火。只有佟玉打瞎卖烟老太太一只眼睛那次，人家找上门来告状，我见吴军医一边给老太太上药包扎，一边把这个流氓士兵骂了个狗血淋头。不知这个得了势的佟某人会不会去

找他的麻烦……

我弓着腰，步履艰难地走到水道街的西药露天市场，很容易地就买到了这种针剂，只花了一副中药的价钱。这次巧遇使我精神为之一振，药还没用已觉得病好了一半，腰也挺直了不少。

我经过家门而不入，直奔头道街的一家小诊所去打针。接待我的小护士拿过药一看，就说：“这是日本药，完全对症。从哪儿弄来的……”

她让我趴在床上，头前放了个痰盂以防呕吐。小护士熟练地将针剂注入了我的血管。顷刻间，我的全身便如火烧般地发热，几次欲呕，但终没吐出来。休息一会儿，她让我后天再来，只收了一元钱费用。

回到家，我把经过告诉老婆，她高兴得直抹眼泪，连说：“老天有眼，吉人自有天相啊！”

第三天，又一针打下去，不到一分钟我就大吐了起来。吐了半盆黄水仍干呕不止，半天才缓过气来。到第五天头上，睡一觉醒来，突然胃口大开，一日三餐大、小米混合粥就咸菜，吃得我精神焕发，腰也全直了起来。最后一次打完针，我又吐了许多黄水。小护士告诉我不用再来了，回去好好调养，暂时别吃油腻，多吃蔬菜水果，就可以完全康复了。前后打针的处置费共花了四块钱。

我这场病，从发病到治愈前后达两个多月时间，由于幸遇贵人而死里逃生。推开门，望着已是雪花飘飘的北国风光，觉得自己二十六岁的生命又复苏了，生活似乎又冲我露出了微笑。

怀着报恩的感激之情，我买了两箱柑橘特意去看望吴军

医夫妇。他看见我恢复了健康非常高兴，看见柑橘又差点没当那包中药给扔出去。

在这小小的诊所里，吴军医看内科，他夫人负责妇科，生意蛮好。

谈起我的病，我问他这是什么药如此神验，他说，这种药是日本人的科研成果（可惜药名被我忘记了）。

“老弟，这次大战，日本是战败了。但是，我告诉你，不要因此小瞧了日本人。据我了解，日本的确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他们将从惨败中汲取教训，重新崛起。谁敢肯定，几十年以后，这小鬼头民族不让全世界再大吃一惊呢？眼下，他们在医学上的成就已不容轻视，还有其他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都是很了不起的……你等着刮目相看吧。”

这是1947年冬天，一个普通军医对我说过的话，五十多年过去了，犹在耳边。我对此人的远见卓识深感震惊。

吴军医从不奢谈政治，但这次和我谈了许多。他认为国共两党的斗争即便有苏、美的调停也不会中止，内战将继续下去。但三五年内必将以共产党的胜利告终。将来的天下，必红无疑。他还告诉我，曹秉森司令已病死在苏联的战犯营里。劝我一定要掌握一门专业技术，靠这个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不劳动者不得食，明白吗？”临走，他送了我许多营养药品，并仔细地说明了服用方法。

告别了这位老大哥一样关怀我心身健康的恩人和生活的指路人，我已经知道今后应该怎样做了。

哥哥和几个朋友用金条买了两辆卡车，开办了一家运输公司。几天工夫又有十几辆私人卡车入了股，运输业务开展得红红火火，几次邀我去公司帮忙。我因为会开各种车，对

修理也略知一二，有心想把汽车修配这行的手艺学到手，但由于对政治的兴趣和一种莫名的懒散，始终没下决心。现在我觉得是时候了。吴军医的一席话，促使我从此走进了产业工人的队伍。

第二天，我换上了一身新衣服。系皮带时觉出腰瘦了一圈，但精神很好。我把心爱的小手枪“张口等”仔细擦拭一遍，连同几十发子弹一同揣上，向哈尔滨市公安局走去。

接待我的是一位姓冉的三十多岁的男子，戴一副近视镜。我向他说明了来意，讲了自己的身份和经历，然后把手枪和子弹一起放在了他面前的桌子上。

姓冉的同志听了非常高兴，对我的直率和坦白有些激动起来。他收下手枪和子弹，并郑重地给我开了一份收据。然后热情地与我聊了起来。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不咎既往。凡是愿意站到人民这边来的人，我们都欢迎。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他说，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抗战时期到了延安，参加了革命。他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想不想参加工作。我说自己大病初愈，得休息一段时间。等身体恢复后是得找一份工作，不然怎么养家糊口。他想了一下，点点头，在一张公文纸上写了一封信交给我，说：“我有个战友，最近分配到一个单位去当军代表了。你去找他，一定会给你安排工作的。”

我接过信，向他表示感谢，鞠个躬就告辞了。说实话，我对这个人宣讲的共产党政策半信半疑，但对这个人很有好感，觉得和以往我所认识的社会上的那些人都不一样。这个人朴实、真诚，让人放心。

走出公安局大门，我掏出兜里的信想细看一下内容。一瞧牛皮纸信封上的几个字，不禁哑然失笑，原来上面的地

址、公司名称，正是哥哥当经理的那个运输公司……我觉得
浑身轻松，两腿生风，大步走向了我应去的那个岗位。

1998年10月26日一稿

1999年4月17日二稿

于沈阳